



曹应旺◎著

# 魅力总理 周恩来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 魅力总理周恩来

曹应旺 著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魅力总理周恩来 / 曹应旺著. —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2014.9

ISBN 978-7-5001-3714-6

I. ①魅… II. ①曹… III. ①周恩来 (1898~1976)  
— 传记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18691号

---

---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 / (010) 68359827; 68359303 (发行部); 68359287 (编辑部)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 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c.com.cn>

责任编辑 / 符 勇

封面设计 / 肖华珍

排 版 / 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规 格 / 710×1000mm 1/16

印 张 / 21

字 数 / 247千字

版 次 / 2014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4年11月第一次

---

ISBN 978-7-5001-3714-6

定价: 4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 目 录

<b>第一章 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b>	<b>1</b>
1. 总管家称谓的由来	4
2. 从毛泽东、周恩来关系的角度看总管家	6
3. 从总理政务、国务、北京全天候人物的角度看总管家	11
4. 从人民的总服务员的角度看总管家	19
5. 周恩来成长为新中国总管家的根源	24
<b>第二章 周恩来和毛泽东</b>	<b>28</b>
1. 协力 同心 共命	29
2. 周恩来与毛泽东诗词	40
3.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	56
4. 毛泽东在外交上对周恩来的倚重	73
5. 毛泽东、周恩来与三峡工程	82
6. 毛泽东、周恩来与南水北调	104

<b>第三章 周恩来和邓小平</b>	<b>114</b>
1. 兄弟和战友	115
2. 政务院工作中周恩来与邓小平	121
3. 邓小平心中的周恩来和他的外交	137
4. 周恩来与邓小平在 1973	145
5. 周恩来与邓小平在 1974	159
6. 周恩来与邓小平在 1975	175
<b>第四章 周恩来和陈云</b>	<b>193</b>
1. 经济运筹中的好搭档	194
<b>第五章 周恩来和陈毅、郭沫若</b>	<b>249</b>
1. 看我公樽俎折强权	250
2.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	264
<b>第六章 周恩来和著名科学家</b>	<b>278</b>
1. “地质工作要当先行”	279
2. 原子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协力	291
3. 导弹航天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协力	299
4. 大任系安危，功勋泽人间	306
<b>第七章 周恩来和水利专家</b>	<b>314</b>
1. 像大禹治水那样为中华民族谋取福利	315
<b>后 记</b>	<b>329</b>

# 第一章

## 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

2009年10月17日，在海南大特区讲坛的讲演。

1960年2月，周恩来曾到海南榆林港、兴隆华侨农场、西联农场和海口市、文昌县、儋县等地视察，并分别为榆林海军基地、西联农场题词，为正在修建的松涛水库题写库名。他一路走，一路看，称赞宝岛是祖国“南海珍珠”；批评一些地方成片地开荒，把森林挤掉了；要求做好水利、造林、水土保持工作；希望将来的海南到处尽是热带作物，到处是花园芬芳。

今天我来到海南，重温周恩来在海南讲过的话，深深地感受到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源头之一，深深地感受到周恩来眼光之深远。

周恩来一生的历史，就是新中国的孕育史，就是新中国的诞生史，就是新中国的成长史。在庆祝新中国建国60年的时候，海南省大特区讲坛组委会的领导，安排我在大特区讲坛讲周恩来的业绩和智慧，这是一个有深刻见解的主意。

组委会领导给我出的题目是《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我感到“总管家”的称谓很符合周恩来独有的特点。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可以用来称谓周恩来，也可以用来称谓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但“总管家”不可以用来称谓毛泽东，不可以用来称谓朱德，也不可以用来称谓刘少奇。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的书，1996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10年后，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受到读者的支持。但我的那本书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即内容不够全面。我写这本书时，为了避免同其他写周恩来的书内容上重复，主要是从经济工作方面去写的；虽然经济工作是基础和主要的方面，但“总管家”的工作包括经济、外交、统战、军事、文化、卫生、体育、教育、党建……各个方面。我今天不按照我那本书的主要内容来讲。这既为了避免重复，也为了对那本书起点补缺的作用。

我想按以下的逻辑结构来讲：第一，总管家称谓的由来；第二，从毛

泽东、周恩来关系的角度看总管家；第三，从总理新中国的政务国务、北京全天候人物的角度看总管家；第四，从人民的总服务员的角度看总管家；第五，周恩来成长为新中国总管家的根源。





# 1

## 总管家称谓的由来

最早称周恩来为总管家的是朱德。据薄一波回忆：1948年春，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在西柏坡向朱德、刘少奇汇报经济工作时，朱德说：“快啦！咱们的周恩来同志快来了，他是个管家的，管这一个家。他会把这个事情办好。”曾担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李琦，在给我的那本书《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作序时写道：“新中国成立前，正在筹建政府机构时，德高望重的朱德同志就曾经说过，周恩来是党内的总管家。”

毛泽东也曾表达过这样的称谓。他曾对许多人感慨：我们的总理，“上至国家大事，下到服务员的工作都关心到了！”韩素音在她的著作《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描述要在战争废墟上建设新国家时写道：“当时的中国可谓千疮百孔。一切要仰仗毛称之为‘大管家’的周恩来修补这条破毯子，并在有朝一日提供新的毯子。”

周恩来认为自己是总理，就得什么事都要管，其职责就是总管家。他对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委负责人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他对他的秘书们也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事一定要报告，不要怕我忙，我不怕忙，我能忙过来。”他认为既然是一国总理，天下大事应该最先知道，第一个知道。他要求秘书们，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情要立即报告给他，不管他是在主持会议，还是在接见外宾，都要立即写条子递进去；如果在睡觉，哪怕刚刚吃下了安眠药，也要立即叫醒他。在这样要求下，往往有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事件连主管部长还不知道，周恩来却先知道了。“文革”动乱中，1968年9月，周恩来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

对中国情况研究有素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周的经历表明，他正是人们所说的总管一切的人。”周恩来逝世时，包括美国媒体在内海外媒体评价周恩来“是北京全天候人物”，“是中国总管一切的人”，“是一位伟大的管理家”。这些评价符合实际情况。

# 2

## 从毛泽东、周恩来关系的 角度看总管家

总管家的称谓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总战略家、总决策者的称谓，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依为命、缺一不可的关系。没有总管家的具体操作，总战略家的战略和决策就可能束之高阁，难以付诸实践。没有总战略家的战略谋划和决策，总管家的具体操作就会失去依据和方向。

这正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在群星灿烂的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毛泽东扮演的是总战略家、理论家、总决策者的角色，周恩来扮演的是总管家、实干家、总执行者的角色。就像郭沫若在一首诗里所说，毛、周两人是“同心、协力、共命”的关系。毛、周两人的协力是和而不同的协力，是差异互补的协力。

儒学大师马一孚曾在中南海怀仁堂挥笔写下两副诗联，分别赠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赠毛泽东的诗联是：“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透过这副诗联，我们看到的毛泽东是提出理论、原则，绘制新中国发展蓝

图的人。赠周恩来的诗联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透过这副诗联，我们看到的周恩来是将原则具体化、目标步骤化，使设计蓝图进入可行性操作之中的人。马一孚先生以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用两副诗联表达了对毛、周之间协力合作关系的深刻认识。

遵义会议以来，周恩来为了让毛泽东集中精力思考战略性的和理论上的重大问题，常常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管理者的角色。建国后更是如此。他多次对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说，毛主席听汇报看文件只记几个大数就够了，我是办具体事的，要记一些具体数字。有一次，一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问周恩来为什么不做些理论工作，周恩来严肃地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的。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

毛泽东在许多事情上都是管方针、路线，管决策，至于怎样去具体落实，全交给周恩来。

例如，在转战陕北及在西柏坡的日子里，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世界上最小最简陋的指挥所里运筹决策，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毛泽东主战略思考，周恩来主组织实施，二人配合得天衣无缝。凡是毛泽东下定决心作出战略决策之后，如何组织部署、如何贯彻执行都由周恩来具体来抓；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无论是后勤供应还是部队调动，都离不开周恩来具体的组织指挥。

建国后，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例如，在1972年中美握手的重大外交事件中，总决策者是毛泽东，具体做好这件事的是周恩来。尼克松回忆说：“谈到具体的国际问题，毛在1972年会晤时一开头就说：‘那些不是应该在我这里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讨论。我讨论哲学问题。’我们会谈中触及了最高领导议程上的一系列问题，但是都是从哲学角度谈

的。最有趣的是，在我此后同周的所有会晤中，他常常提到毛所谈的话就是他在谈判中所持立场的指南。”

又例如，在治水方面，毛泽东以雄伟的气魄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治理、开发、保护江河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高峡出平湖”“一定要根治海河”“南水北调”“保证遇早有水，遇涝排水”“兴修水利、保持水土”等等。如何将这些战略目标步骤化、具体化，毛泽东得益于周恩来。周恩来总是积极稳妥、周到细致地组织实施这些战略目标，善于将务虚与务实、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步骤、远景与近期、战略与战术结合起来，并鞠躬尽瘁地进入实际操作之中。仅仅从治水这一点，我们可以领悟到，为什么人们“寻找毛泽东”总是伴随着“怀念周恩来”。

尼克松在北京访问时，以其政治家的敏锐眼光，看出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战略家、决策者和总管家、执行者的关系。尼克松说：“毛是政治局的主席，即使在风烛残年也仍然是公认的领袖。而周是总执行官。”尼克松认为，周恩来以其“卓越的行政才能和似乎不知疲倦的个人精力”进行具体而务实的管理，“好让毛全神贯注于做国家超然的精神领袖”。

尼克松说：“中国革命没有毛，就绝不会燃起火来。而没有周，它就会烧光。”这虽是极而言之的话，但却道出了毛、周之间差异互补、相辅相成的关系。毛泽东早已看到这一关系。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总结中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尼克松羡慕毛泽东有周恩来这样的好帮手。开国时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也羡慕毛泽东有周恩来这样一位现成的总理，米高扬甚至说，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建国前国民党人阎锡山曾叹息“国民党里没有周恩来这样的人才”；而胡宗南曾对蒋介石留不住周恩来，“深

为校长惜”。

建国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共和国总理，一直到去世。“主席”和“总理”分别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代名词。二人在这两个最重要的岗位上，虽也有过1958年批反冒进和“文革”中批纠极左的分歧，但总起来看，二人协力的长期性、重要性，可谓世所罕见。

周恩来热爱毛泽东，尊敬毛泽东，处处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在周恩来面前，任何损害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图谋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周恩来率团出访莫斯科时，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粗野地说：“我们可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的毛泽东呢？苏中关系不好就是他们两个人搞的！”周恩来就此事向苏方提出抗议，指出这是苏方在挑衅，同时马上报告了毛泽东。

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在周恩来和毛泽东数不清的单独会面中，凡是周恩来提出的被毛泽东采纳的正确意见，周恩来公开传达时总说是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到灾区视察、慰问，总要讲：“毛主席让来看望大家，慰问大家。”1962年6月，周恩来视察延边，群众欢呼起来，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脱口说：“各族人民群众是多么热爱总理啊！”周恩来立即纠正道：“这是毛主席的威望，党的威望。”

在历次公开的重大活动中，周恩来总是突出毛泽东的形象，把聚光灯的焦点对准毛泽东。有一次，一位记者为了抢拍毛主席的照片，不顾一切地把长镜头往前伸，竟从周恩来的肩上伸了出去。拍完照片，周恩来回过头来，记者才大吃一惊：“啊！总理！”

毛泽东信任周恩来，尊重周恩来，把周恩来那里看成办事的中心，许多大事都交给周恩来去办。

毛泽东对周恩来，有时见面亲切地称呼“恩来”；有时在急件上直呼“周”；有时在书信中称呼“周总理”；有时则尊重地称呼“总理”。毛泽东

与他人交往中，直接而简便地呼姓或完全以职务代称是极少见的。“周”和“总理”这两种称呼方式，从一个细小的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周恩来信赖中透出自然，尊重中透出亲近。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就像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名和碑文由他们两人合作书写而成的一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象征，是新中国历史的一块基石。只有极端仇视新中国的人才会歪曲这个象征，玷污这块基石。



# 3

## 从总理政务、国务、北京全天候人物的角度看总管家

如果说上一个角度讲的周恩来这位总管家是领袖毛泽东的总管家，那么，现在这个角度是要讲周恩来这位总管家是国家政务、国务的总管家。

周恩来自开国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1954年一届人大以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直到去世，在总理这个位置上任职26年3个月零7天。他总管政务、国务，中心是经济工作。他说，“经济是基础”，如果经济基础不稳，“新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立不住”，“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

可是新中国接受的的是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摊子，连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造不了，发展经济的任务艰巨而繁重。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发展目标，并同陈云、李富春一起具体组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为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后来，总结苏联片面发展重工



业影响民生和我们自己搞“大跃进”破坏了农业的教训，周恩来又同毛泽东一起改工业化的目标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邓小平的三步发展、百年图强，正是承继了这个目标。

周恩来具体组织为四个现代化目标奋斗时，特别重视农业和科技。他为这两个方面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对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农业方面，他尤其重视水利和北方农业。水利方面，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和许多重大水利工程都留下了他的文献、声音、足迹和身影，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极大地提高了发展农业的物质基础。他担任中央北方农业小组组长，直接抓北方八省市（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内蒙、辽宁）的农业，扭转了南粮北调局面，为后来的北粮南调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担任总理时，兼任外交部长近9年之久。1958年2月开始，他不再兼任外长，但仍然主管外交工作。他在26年的总理生涯中，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全面而杰出的贡献，堪称中国外交第一人，而且被尼克松称为“世界头号外交家”。

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坚持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是周恩来处理外交问题的出发点。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强加给了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当时的中国政府是跪在地上办外交，丧权辱国，毫无独立可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战胜国之一，列强却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交给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也是战胜国，可苏、美、英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却准备让苏联恢复1905年日俄战争后在中国东北丧失的各项权益。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就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维护国家独立，坚持独立自主。将这一方针具体化的是周恩来。开国后头几个月周恩来继毛泽东之后到莫斯科，主持同苏联人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雅尔塔损害中国权益的协定，否定了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的不平等